



Classic Collections of Foreign Poetry

外国经典诗歌珍藏丛书

波德莱尔诗选

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

柳鸣九◎主编

李玉民◎编选

郭宏安 李玉民 等◎译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波德莱尔诗选 / 李玉民编选; 郭宏安译. --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1.12

(外国经典诗歌珍藏丛书 / 柳鸣九主编)

ISBN 978-7-5387-3877-3

I. ①波… II. ①李… ②郭… III. ①诗集 - 法国 - 近代 IV. ①I565.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50875 号

出品人 陈琛

责任编辑 陈秋旭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,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,违者必究。

波德莱尔诗选

(外国经典诗歌珍藏丛书)

李玉民 编选

出版发行 /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科 / 0431-86012939

网址 / www.shidaichina.com

印刷 /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
开本 / 710×1000 毫米 1/16 字数 / 171 千字 印张 / 15

版次 /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/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/ 29.80 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编委会名单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主 编:柳鸣九

编 委:王守仁 叶廷芳 付 浩 朱 虹 杨武能 周殿富
罗新璋 赵 岩 郭力家 顾蕴璞 屠 岸

诗歌总目

(按诗人生辰年代排列)

《莎士比亚诗选》

《雪莱诗选》

《歌德诗选》

《席勒诗选》

《华兹华斯诗选》

《拜伦诗选》

《济慈诗选》

《海涅诗选》

《普希金诗选》

《雨果诗选》

《惠特曼诗选》

《莱蒙托夫诗选》

《波德莱尔诗选》

《狄金森诗选》

《泰戈尔诗选》

《叶芝诗选》

《里尔克诗选》

《阿波利奈尔诗选》

《纪伯伦诗选》

《叶赛宁诗选》

编选者简介：

李玉民，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。首都师范大学教授。从事法国纯文学翻译近三十年，译著六十多种，约两千余万家。主要译作：小说有雨果的《巴黎圣母院》、《悲惨世界》、巴尔扎克的《幽谷百合》、大仲马的《三个火枪手》、《基督山伯爵》、莫泊桑的《一生》、《漂亮朋友》、《羊脂球》等；戏剧有《缪塞戏剧选》、《加缪全集·戏剧卷》等；诗歌有阿波利奈尔的《烧酒集》、《图画诗集》、《艾吕雅诗选》等。此外，编选并翻译《缪塞精选集》、《阿波利奈尔精选集》、《红德精选集》；米什莱的《鸟》、《海》、《山》；主编《纪德文集》（五卷）、《法国诗人传记丛书》（十卷）。2010年当代法国作家佩纳克的长篇小说《上学的烦恼》获傅雷翻译奖。李玉民的译作中，有半数作品是他首次介绍给中国读者的。他主张文学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，译作应是给读者以文学享受的作品。

译者简介：

郭宏安，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，博士生导师，法国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，著名翻译家，尤以研究和翻译波德莱尔的著作而闻名。学术著作有《波德莱尔讨论及其他》、《从蒙受田到加缪》、《从阅读到批评》等。译著有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，加缪的小说等。

理解波德莱尔是一个过程（序）

李玉民

法国知识界的朋友爱把诗歌挂在口头，知道我翻译过不少法国诗歌，谈话中就问我喜爱哪些法国诗人。我列举了缪塞、拉马丁、雨果、魏尔伦、阿波利奈尔、艾吕雅等，没有波德莱尔的大名。不料碰到个叫真儿的，一个叫奥黛特的法国文学教师，她就问我：“你认为谁是法国最伟大的诗人？”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当然是雨果了！”她当即反驳：“为什么当然！要知道，法国大学里，现在不怎么讲雨果了。学生写论文，更多地选择波德莱尔。我和好多同事都认为：法国最伟大的诗人是波德莱尔。”

在我的印象中，波德莱尔是个“颓废诗人”，我刚表露出这种意思，法国人马上接口说：“何止颓废诗人，还给他冠以恶魔诗人、尸体诗人、坟墓诗人……这不足为奇。像波德莱尔这样的创新者，无论在诗歌的内容上还是形式上，都走得太远，他的《恶之花》刺激了那些守旧派的末神经。他们在报刊杂志上大量发表评论文章，诽谤并诅咒《恶之花》……”显然她对波德

莱尔的身世了如指掌,她说1857年6月,《恶之花》刚问世,法国当局就急不可待,立刻组织封杀,甚至启动法律程序,内政部以《恶之花》作者扰乱公共道德的罪名,督促检察厅立案。检察厅便奉命传讯作者和出版者,并当即查封了《恶之花》。说来也巧,提起公诉的帝国检察官皮纳尔,也以同样的罪名,起诉了在同年出版的《包法利夫人》的作者福楼拜。最后,法庭判处波德莱尔罚款三百法郎,并勒令《诗集》中删除六首所谓的“淫诗”。这成为法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两起公案。

摧毁不了的《恶之花》却开得更加旺盛而绚丽,四年后再版,删去了六首禁诗,又增补了三十五首,共计一百二十九首,获得更大的成功。波德莱尔在雨果、福楼拜等有识之士的赞美和声援下,信心更足,他进一步修定诗集,准备出第三版。而且这一时期,他先后出版了艺术论著《1859年美展》、《人造天堂》以及不少散文诗,在文坛上的地位更加重要,也更加巩固,成为魏尔伦、马拉美等新一代诗人的精神领袖。波德莱尔称之为“《恶之花》的姐妹篇”的《巴黎的忧郁》,从1857年开始创作,进展十分缓慢,花了十年工夫,只写下五十首,未待出版,他于1857年就英年早逝。同样,《恶之花》的第三版修定,也未如愿完成。这两本诗集的定本,都是在诗人去世后,经友人整理出版的。

波德莱尔仅以《恶之花》和《巴黎的忧郁》两部诗集,就登上时代的高峰,同雨果等大诗人比肩,成为西方现代派诗歌的

鼻祖，完成了从恶魔诗人到非凡诗人转变的神话。这让我想到另一个神话，大画家梵·高的命运。梵·高学艺极晚，二十六岁起步；包括学艺时间在内，他的全部作品仅仅用了十一年。他生性桀骜不驯，顽固地拒绝向现实低头，自己选定了目标，就不顾所有人反对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，哪怕落个受诅咒画家的恶名，哪怕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，也要坚定地走向心中的憧憬。他的这一性格特点，是他绝对痛苦和绝对成功的根源。终于，他解放了绘画的动作，改变了绘画本身的概念，练就了类似中国画大写意的“书法—绘画”法，以其独特的方式和设色，表现出景物所放射的造型力量或光波的流动，并以疯狂的速度画出一处风物难以捕捉的眩晕之态。他在生前最后五年的伟大绘画创作期间，画出了数量惊人的杰作，不是精品，而是极品，为野兽主义、表现主义和抽象表现主义开了先河，完成了从受诅咒的艺术家到非凡艺术家转变的神话。

梵·高是个孤独而狂野的散步者，而波德莱尔则是个孤独而忧郁的散步者，一个游荡在大自然中，一个徘徊在巴黎的街巷。殊途同归，两个人的个性都爆发出超常的能量，在各自的领域创造了奇迹。这样的个性不可复制，因果关系错综复杂，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大小力量全方位起作用的结果。主体在其成长的各个阶段，根本无法预见家庭、社会、思潮、个人经历、地域环境等等因素，能直接或间接产生什么影响，会被相互作用的各种力量拉向何方。因此，不可确定性就成为

主体生存的本质。梵·高完全可能成为优秀的牧师（继承父业），杰出的画商（如其伯父）、出色的通俗画家（堪比师友），度过富足而安逸的一生。可见，梵·高自主自为，可以是也可以不是他已成的样子。同样，波德莱尔之所以成为世界级的大诗人，除了安德烈·布勒东所说的，寓于我们每人身上的这种“砸不开的黑色内核”之谜而外，他的身世总有一些事件可作为路标，指引我们追踪他的足迹。

夏尔·波德莱尔的公案，约瑟夫——弗朗索瓦·波德莱尔六旬续弦，娶了一个二十六岁的孤女卡罗琳·阿尔尚博—德菲斯，隔年得子：夏尔于1821年4月9日生于巴黎。父亲虽出身农家，却受过良好教育，在巴黎大学修过哲学和神学，任神职数年后离职，到一位公爵府上当了家庭教师，沾染些许贵族习气。他热爱绘画，又颇有些收藏，常带着年幼的夏尔到卢森堡公园散步，对着美丽的雕像给儿子讲神话与传说，可以说是艺术的启蒙教育。作为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信徒，他似乎无意中也给了儿子思想的启蒙教育。父亲的气质、作风、思想和爱好，在波德莱尔幼年的心灵中播下了种子，父亲的形象就成了他“最初的强烈爱好”。如果假以天年，父亲再多活十年八载，那么波德莱尔的成长该是另一番景象。只可惜在他六岁时，父亲就去世了，生活发生了突变。

年轻的母亲很快就改嫁，让一个同父亲截然相反的人闯进了波德莱尔的生活，给他的心灵造成了终生难愈的创伤。

继父欧比克是个军人。为人古板、生硬，心胸褊狭，企图用资产阶级的秩序和道德，将聪颖的继子培养成一个循规蹈矩的官场人物，因而同藐视习俗、我行我素的波德莱尔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对立，这在波德莱尔的心灵里第一次激发出反抗的火花。波德莱尔随家迁徙，先后在里昂、巴黎读中学，他的希腊文、拉丁文和法文学科成绩优异，多次获奖。他那敏感而好激动的天性，随着年龄的增长就逐渐彰显，总好异想天开，甚至有些神秘兮兮，颇为玩世不恭。他这个学生才华出众，但是不守纪律，终因拒不交出同学在课堂上传递的纸条，被路易大帝中学开除。

波德莱尔虽被学校开除，但他于次年，即1839年，还是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。在如何走上社会，安排未来的问题，又与继父产生了冲突。继父希望他进入外交界，将来谋个显要的位置；可是，波德莱尔却始终憧憬“自由的生活”，他无法预见未来，但是心中有了目标，就可以确定并规划未来了。他大量涉猎罗马晚期作家的著作。与那种颓废的情调产生共鸣；他还喜爱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七星社诗人的诗作，激赏那种严谨的声律；在当代他爱读马尔扎克的小说，并因结识了作家本人而深感荣幸，深受鼓舞；同时他也叹服浪漫主义诗人雨果、戈蒂耶、拜伦、雪莱作品中那种“美的最新近的、最现代的表现”；他更是频频光顾巴黎美术展览会，不仅唤起他“最初的强烈爱好”，还萌生了写画评的念头。这期间，他加入了众多

狂放不羁的文学青年之列。

波德莱尔终日出入酒吧、咖啡馆，纵情声色，同一个犹太妓女“斜眼”莎拉交往，浪迹在巴黎这座“病城”的娱乐场所。家庭自然十分不满他这种近乎放荡的生活，在管教不利、规劝无效的情况下，决定让他出游，以图暂时割断他同巴黎的联系，引导他的生活走上正规。1841年6月9日，波德莱尔登上“南方远洋邮船”，从波尔多启程，准备前往加尔各答，将逗留一年半时间。然而，他中途在毛里求斯岛下船。在波旁岛浏览一个半月，领略了异域风光和情调，这种意想不到的收获，为他后来的文学活动增添了实感。他仍念念不忘巴黎的生活，很快中断流行，返回法国。

1842年2月，波德莱尔回到巴黎，越发不能忍受家庭的束缚。正巧他业已成年，可以掌握父亲留给他的遗产（约十万金法郎），于是离开家庭过独立生活。他鄙夷那些想为阶级社会效力的人，厌弃一切职业，特意用惊世骇俗的装束和举止标新立异，表示他对资产阶级的轻蔑与唾弃。他这样放浪形骸，本意就是“追求崇高”，不同流俗，颇有几分以恶搞的方式反抗他的家庭与社会的味道。1842年，他遇到黑白混血姑娘，小剧院的二流演员雅娜·杜瓦尔，结成了亲密而长久的关系，受其影响，此后他的生活有所收敛，更多的心思用到创作上了。这期间，他同已有名气的戈蒂埃、有志于诗歌的班维尔交往甚密。可是，他这两年过度挥霍，用掉了半数败产，1844年，家

庭强加给他一个经济监管人，每月只给他可怜的二百法郎，这对他沉重打击，不亚于他父亲的去世。他在债主追索下的日子十分难熬，1845年6月30日，他甚至企图操刀自杀。

度过这次危机，波德莱尔似乎更加坚强了，至少他的目标更加明确，在创作方面三头并进。一是诗歌创作，至1843年，他已经作了二十余首未来的《恶之花》；1846年，他向朋友提起计划出一本诗集，题为《累斯波斯岛女人》（或《同性恋女人》），这是十年后出版的《恶之花》的初名；二是撰写并发表画评：《1845年美术展览会》、《1846年美术展览会》，完整地阐述他的新颖的艺术观，奠定了他作为艺术评论家的地位；三是发现并激赏美国作家爱伦·坡的作品，为之入迷，自己翻译并发表爱伦·坡的短篇小说《金龟子》（1845）始，十七年间翻译出版了爱伦·坡的大量作品，堪称翻译文学的范本。

1847年至1851年，是波德莱尔从政治热情高潮到完全脱离政治的时期。1847年，巴黎一开始社会和政治动荡，波德莱尔便投身进去，不久还和朋友创建革命小报《公安报》，登记参加了“共和派中心协会”。1848年革命爆发时，他并不了解这场革命的意义，只当作他泄愤的一次机会，于私发泄对他继父欧比克的仇恨，于公则要报复和破坏资产阶级社会，其中当然也“寄托一些有如空中楼阁一样的乌托邦”。他背着枪，在街垒中奔忙，手上散发着火药味，满口嚷着“枪毙欧比克将军”。然而，革命失败了，尤其路易·波拿巴窃取革命成果，于

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，改共和为帝制，波德莱尔目睹了这种政局大变动，对政治彻底失望，“决定从此不介入人类的任何论争”。

1852年之后，波德莱尔的创作进入高潮期。他是个“苦吟”诗人，“写得很苦”，“哪怕最小的一个词也透露出他达到那样一个高度所付的努力”（巴雷斯语），但是几年散见于报刊杂志上的诗作，还有尚未发表的，足可以结集出版了。但是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《恶之花》，只好托朋友关系，由爱好诗歌，给邦维尔出过诗集的普莱·马尼拉西斯承接。注定要遭受磨难的《恶之花》终于问世了，一本薄薄的诗集，注定要给作者生前招来极大的耻辱，身后永续极大的荣名，这也是绝无仅有的文学现象。

波德莱尔在诗歌上的继承和创新，自然有他自己一套文艺理论的支撑。他在写诗的同时，也发表许多评论，涉猎极广，包括小说、诗歌、戏剧、绘画、雕塑、音乐、舞蹈等领域。他的文学批评方面的文章汇编成集，题为《浪漫派的艺术》，而另一本集子《美学珍玩》，则收入了艺术方面的文字。这两部专集珠与璧合，水乳交融，充分反映了他那时代思潮变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，在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念，奠定了他在法国十九世纪批评界的重要地位，更有他在诗歌上创新实例为佐证，这就为后来一些新流派的生长提供了土壤和阳光。

就在《恶之花》出版的两个月前，继父欧比克将军去世了，

这就给波德莱尔跟家庭的冷战画上了句号；次年，波德莱尔终于前往下诺曼底省的港口城市翁弗勒尔，看望他的母亲。至此，波德莱尔自1842年离家独立生活，历时十五年，到《恶之花》问世为标志，他的足迹从模糊变得清晰，想必接近了他心中的目标。他不顾一切，迷恋巴黎，同这座“病城”结下了特殊的关系，决心在这“地狱”中寻找天堂。他在巴黎的街巷孤独地游荡，始终是他找回自我、回归本心的时刻，也是他排除家庭和社会各种干扰的时刻。他总爱去无人涉足的丑陋而污秽的地方，到贫穷、苦难、孤独、绝望、死亡丛生的罪恶之园中，采撷恶之花，在娼妓、乞丐、醉鬼、孤苦老人身上捕捉现代生活的律动：

沿着古旧城郊，一排排破房
拉下遮蔽秘密淫荡的百叶窗……
在每一个角落寻觅的偶然，
绊在字眼上，就像绊着了石头，
有时会碰上诗句，梦想了许久。

《太阳》

多么凝练的诗句，透露出的信息，足可以破解诗人波德莱尔一生的奥秘。诗人游荡的地点，不是巴黎光鲜亮丽的街区，而是“古旧的城郊”，贫穷和污秽麇集的地方。诗人“闪着永恒之光的大眼”，探测着百叶窗遮蔽的“私密淫荡”，即他在

诗中一再罗列的所有丑恶的东西。“发掘恶中之美”，走在恶中间的脚步，“偶然绊在字眼上”，便得到了诗句，而诗句还要梦想许多，方始绽放恶之花。得之偶然，再千锤百炼，缓慢归缓慢，慢吟出来的诗，却经得起长久时间的考验，这是因为从恶中发掘出来的“美啊！你这怪物，只要打开我爱而不识的无限之门。”“来自上帝或魔王，又有何妨？”

我能理解到，这一步，实属不易。想当初，波德莱尔的诗我读不进去，甚至有些排斥，有两大障碍。一是直观的；翻开《恶之花》，满篇难见赏心悦目的诗句，尽是丑陋污秽的词语，难以卒读，同中国古诗词，甚至同法国浪漫派，乃至象征派诗歌相去甚远。二是意象的：波德莱尔的诗，往往思想领先，抽象的词汇用得，读来我很不习惯。而这两方面，恰恰是波德莱尔诗作赖以传世的两大特点。

波德莱尔颇为复杂的文艺思想中，有一个重要观点，就是抛弃“真善美不可分割”的传统观念，可以说代之以“真恶美”。他说：“什么叫诗？什么是诗的目的？就是把善跟美区别来，发掘恶中之美。”“我觉得从恶中提出美，对我乃是愉快的事情，而且，工作越困难，越是喜悦。”他将善和美分开，就是要将恶跟美结合起来，只因善与真已经脱节，而恶才是最真实的。“波德莱尔以为自己代表浪漫主义，可是他却摒弃其浮华的词藻和空想的习惯，只保留浪漫主义对其现代性的颤动的感情”（纪德语）。他求真求实，直面现实的恶，从恶中发掘美，这是他在

诗歌的内容上的创新，与浪漫主义背道而驰了。

直面现实的恶，从恶中发掘出美来，就必然换一种思路，采用另一套词语了，这正是我所不习惯的另一种表达方式：生猛、刺激、突兀、出乎意料，如《幻想的版画》：

这奇特的幽灵，全部装来只是
丑陋的王冠，有狂欢节的气息，
滑稽可笑地扣在骷髅的额前。

这些词组的搭配前所未见，完全是波德莱尔式的，十分独特，读者很难一下子抓住准确的意思。正如纪德所说：“波德莱尔忍受不了固定的词组，不出所料的隐喻；他经常乐于利用一开始无法准确看出的关系，把读者搞得晕头转向；他弃平庸，喜古怪，很有贵族气派；他认为形象与词语的组合之所以完美，不在于它能使用，而相反在于它只能使用一次。”就连诗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，他在《巴黎的梦》中就写道：

这一片可怖的风光，
从未经世人的俗眼，
朦胧遥远，它的形象
今晨又令我醺醺然。

千真万确，我这俗人之眼，看到诗人描绘的这片“可怖的风光”，不是醺醺，而是昏昏然，晕头转向了，有时不免说些离谱的话，还是引名家的论述来得稳妥。爱伦·坡说：“抓不住不可触摸之物者不是诗人。”最不可触摸之物，无疑是思想和精神了。因此，波德莱尔的诗另一个我不习惯的特点，就是他的诗篇往往围绕着一个思想组织形象。如《精神的黎明》：

朱红白亮的晨曦，噬人的理想，
手挽着手射入堕落者的房中，
一种报复性的神秘起了作用，
天使醒了，在沉睡的野兽身上。

这首诗以“精神的黎明”为主旨，组织“朱红白亮的晨曦”、“射入”、“醒了”、“沉睡”这些形象反映黎明，但同时又使用“噬人的理想”、“报复性的神秘”、“起了作用”这样抽象词语，以及“堕落者”、“天使”、“野兽”这样泛称的词来传递主旨精神。《恶之花》中六组诗标题：《忧郁和理想》、《巴黎风貌》、《酒》、《恶之花》、《反抗》、《死亡》等，以及小标题，大多用表达思想的抽象词。如果说《恶之花》的诗往往由思想引领，那么《巴黎的忧郁》诸诗则偏重描写，类似寓言故事，有人物，有情节，再从故事中得出一种观念性的结论。例如，《老妇人的绝望》：